

高等农业教育,2007-3,3:80-83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2007-3,3:80-83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之比较

徐莉莉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文章主要从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知识三个方面,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进行比较,认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两者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实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关键词: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81(2007)3-0080-04

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创立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实践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结合中国教育实践,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跟头”,创立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的生活教育理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两者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实存在着质的差异,有必要进行比较。

一、教育与生活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典型命题,即“教育即生活”。针对美国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严重脱离的现实,这一命题强调了教育过程,突出了教育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一是生活离不开教育。杜威强调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1]“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生活。”^[2]二是生长是生活的特征,而教育就是生长。所谓生长,就是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的社会生活里,凡是最有效地教养儿童分享种族所继承下来的资源,以及使他运用自己能力来为社会服务的一切力量,都被收集起来。所以,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

来生活的准备”。^[3]因此,教育应该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三是教育是对生活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对个人,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改造过程。在杜威看来,教育过程是一个社会经验不断改组、改造和转化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

杜威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一种生活,一种发展,学校生活、家庭生活、集体生活、社会生活都是教育。各种场合的教育,实质上进行的是不同形式的生活。教育既始于社会又将归于社会,因此,在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三者之中,社会生活是整合其他两种生活的关键。“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社会生活给予他一切努力和一切成就的不自觉的统一性和背景。”他主张学校要把教育和学生目前的生活相结合,教会学生如何适应目前的生活环境。“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来说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像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形成呆板而死气沉沉。”^[4]教育上的许多失败就是由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教育丝毫也离不开生活,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如果教育即是生活,我们会获得许多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6-06-13

作者简介:徐莉莉(1972-),女,教育系,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教育。

东西,因为一切生活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一面、艺术和文化的一面以及相互交往的一面。教育的最终目标只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育结果与社会生活没有较好地结合,那么教育就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意义。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探索,陶行知发展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并“翻了半个跟头”,提出了“生活即教育”。他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我们也用的很多而且很熟的,就是‘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在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边有什么用意。现在,我们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5]所谓“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认为生活含有对人的教育作用,“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6]他在《生活教育》一文中写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陶行知在 1918 年发表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一文中讲过,“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的一切所需要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7]。所以,陶行知说的“生活即教育”,既是从范围上说明教育与生活同其广大,也是从作用上说明教育是通过生活表现出来的。教育又促进生活之变化,“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8]他强调,只有“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才算得上是促进生活之变化的教育。教育随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生活无时不变,教育也随之发展,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9]“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9]“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10]

在陶行知看来,杜威“教育即生活”,归根到底乃是一种“假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浓缩成一个狭隘的装饰品般的生活空间,这样的教育实际上只是“鸟笼般的开放”,不是“生活即教育”所需,不是真正的开放。“像把树枝和花草放进鸟笼,让小鸟与花草在笼中游戏,不是任鸟儿在大自然中翱翔”。陶行知问到:这笼中的鸟是不是就享受了大自然的乐趣,从而获得了自由的生活!学生所受的教育是不是因此就与生活打成了一片!他还痛心指出:有些鸟儿,习惯了鸟笼里的生活,不愿意到大自然中去,以为这鸟笼就是世界,那害了

学生,学成后却成了“书呆子”。与杜威相反,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是充满生机的,它“叫教育从书本的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11]“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用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12]把生活和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主张各种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最好在生活上进行。这样的生活教育,开阔了教育视野,内涵十分丰富,受教育者就如同鸟儿回到广阔的树林,可以自在地翱翔。

“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他们都强调生活与教育的一致性,突出生活的教育意义。但杜威把教育作为巩固和发展美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教育即生活”侧重从目的上强调教育的指导作用,其根本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知能,而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站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角度,指导和改造农民的生活,开发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推行大众教育。

二、学校与社会

与“教育即生活”相关联,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另一个命题是“学校即社会”。杜威认为传统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学校与家庭、社会相脱离,学校教育与现实生活相隔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将学校建设成为雏形的社会,这就是他的“学校即社会”的思想基础。

在杜威看来,“现实生活是如此复杂,以致儿童不可能同它接触而不陷于迷乱,他不是被正在进行的那种活动的多样性所淹没,以致失去自己有条不紊的反应能力,便是被各种不同的活动所刺激,以致他的能力过早地被发现,致使他的教育不适当地偏于一面或者陷于解体。”因而社会不是个好的教育环境。杜威强调学校不应该是脱离生活实际的学习场所,他认为,“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13]凡现实中的工厂、商店、银行等各种社会机构,都可以引入学校,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14]杜威提出:“我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15]学校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呈现儿童现在的社会生活。为了做到“学校即社会”,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16]

陶行知经过反复的实践探索,逐渐认识到这一命题

的局限性,并加以改造。他说:“‘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个筋头,变成‘社会即学校’……。‘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他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17]而且这种教育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成了一道高墙”,把学校与社会生活隔开了。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这样一来,“社会即学校”才是真正把学校摆进社会里面,从而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学校真正成了社会生活所必需。陶行知认为,“社会即学校”,就是应当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办学校,把学校办成符合社会实际情况,适应广大人民生活需要,能真正帮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的学校。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18]与“生活即教育”一样,“社会即学校”也在于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

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杜威“学校即社会”的立意就是要冲破传统意义上的死学校,使学校社会化;但社会化的学校毕竟还不是真实的社会生活本身,是鸟笼而不是鸟的世界。而“社会即学校”,能使学校与社会真正打通,并融为一体。

三、教育与知识

杜威认为知识就是经验,而经验就是人与自然所创造的环境的“交涉”。从批判传统学校教育采用的“从听中学”出发,以实现其教育目的,实施教育内容,杜威又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从做中学”,这是他要儿童获得日常生活经验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杜威认为,儿童具有天赋的社交、制造、表现等本能,传统教学中采用的学生“静听”的模式,儿童很少有活动的机会和地方,这样势必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所以,学校应该创造出社会化的生活环境,让学生在“做中学”。因此,杜威强调教学应该从儿童的现在生活经验出发,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实际活动中进行学习,注重学生的直接知识的获得,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倡导“从做中学”、“从做事里面求学问”。

“从做中学”充分体现了学与做的结合,也就是知与行的结合。在“教室中,……在仅是教科书和教师才有发言权的时候,那发展智慧和性格的学习便不会发生;

不管学生的经验背景在某一时期是如何贫乏和微薄的,只有当有机会从其经验中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清楚地写道:“在第一阶段,学生的知识表明为聪明、才力,就是做事的能力”。“人们最初的知识 and 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应该认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总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儿童应该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和发展自己,“学校是相互联系的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就是“从做中学”。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一切建造、操纵、积极的行动和制作的冲动给予运用和满足的机会。如果儿童能够从“做中学”增添新的、更有意义的经验,它们的知识就会成为“有用的东西”,如果不从做的事情中去学习,那冲动只能是冲动,任何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成为梦想。为此学校应该创造出社会化的生活环境,成为雏形社会,让学生从事他们所感兴趣的活动,培养儿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种过程能使学生丰富自己的经验,为将来走向社会作准备。杜威在强调学生主动性的同时,也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他强调说:儿童“要是看见人家做事,就要动手,最不愿意旁观。这些天性,做教员的应该利用它做有益的事件,随机引导,让它发展起来才对。”^[19]因此,对于学校来说,“所要求的是每一个儿童应该有机会在有意义的活动中使用他的能力。”

儿童的“从做中学”是在现实场景中教师指导下的“做中学”。如果教育者能对活动加以重视、选择和利用,以满足儿童的天然欲望,使儿童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中进行学习,那也许标志着对儿童一生有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如果教育者忽视了,这种机会就会一去而不复返,正所谓的“如果在讲课中听任教科书的摆布,甚至让教科书占据主宰地位,其结果只能使思维变得迟钝。”^[20]

陶行知在教育与知识问题上发展了杜威的思想,“……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强调教育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认为教育就是在“做”上学,在“做”上教,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也不能“教师讲,学生听”,而应“教”、“学”、“做”一体化,“一面做,一面学,一面教”,充分体现教学法与生活法的合一。1927年11月,陶行知发表《教学做合一》一文,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

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教学做”是一个整体,“做”是这个整体的核心。“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21]他说:“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22]他在解释什么是做时说:“做含有行为、思想、产生新价值三种特性,由行动而产生思想,由思想产生新价值”,“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一句话,“做”就是实践,就是行动。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做,“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

陶行知所说的“做”,既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又是知、行、意的统一,还是“手脑心并用”、“知行合一”的过程。陶行知认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不是不要书,它要用的书数目之大,比现在的教科书要多得多,而是要教育学生读活书,不要读死书;要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使学校联系人们生活斗争实际,使学生从狭小的校园和书本中走出来,使他们得到书本上所没有而又比书本知识更丰富、更生动的知识。在他看来,“做”的深义就是要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教学做合一”即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探寻出路。

无论是“做中学”还是“教学做合一”,两者都强调“做”,重视实践的作用。杜威主张的“从做中学”所强调的“做”只是满足儿童的活动本能,带有狭隘的经验主义色彩。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实践。

不可否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诸如,他们都猛烈抨击传统教育的缺陷、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等。陶行知自己也承认:“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美国历史学家休伯特·布朗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称作是“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型”,是不无一定道理的。由于陶行知和杜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他们的教育理论在形式上和内涵上都存在本质的区别。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说到底是把生活从属于教育,把社会缩小进学校,主张实验主义教育法,并没有把教育解放出来,也没有把学校拓展开来。而陶行知立足于中国教育现状,吸取、借鉴并改造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改造开出了一剂良方,建立起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式教育体系,对中国的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会. 陶行知文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45.
- [2][7][16] 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25,25,225.
- [3] 孙有中,裴雯. 杜威文选——新旧个人主义[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211.
- [4] 杜威.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6.
- [5][6][11][18]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生活即教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89,649,199—200,181—182.
- [8][10] 广西陶行知研究会. 学习陶行知资料选编[Z]. 1991.
- [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教育文选——生活教育之性质[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50.
- [12]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 谈生活教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28.
- [13][14][15]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 杜威教育论著选——我的教育信条[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1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教育文选[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111.
- [19]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M]. 教育中华书局,1998. 330.
- [20] 杜威著.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382.
- [21]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666.
- [22] 陶行知. 中国教育改造[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08.
- [23] 陈学恂. 中国现代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96.

(责任编辑与校对 张艳)